

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集安市人参产业融合的调查分析

姜卓简, 范静, 黄婧玉

(吉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8)

摘要:以吉林省集安市人参产业融合发展为研究对象,基于225份参农调查问卷数据,从参农的资源禀赋差异、感知行为控制、利益联结紧密度和对其他利益主体满意度四个维度选取12个变量,运用Logit模型分析人参产业融合过程中参农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67.6%的参农愿意参与产业融合,整体参与意愿较高;资源禀赋差异、感知行为控制、利益联结紧密度和对其他主体满意度都是参农参与产业融合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价格风险、参与企业务工、分享旅游收益和对合作社的需求程度、企业满意度、合作社满意度对参农参与产业融合的意愿都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农村产业融合;农户;参与意愿;人参产业

中图分类号:F321;F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8)06-0037-06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integration of ginseng industry in Ji'an city

JIANG Zhuojian, FAN Jing, HUANG Jingyu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l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8,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ginseng industry integration in Ji'an city of Jili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225 questionnaires, selecting 12 variables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farmers planting ginseng, including resources endowment difference,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interest linkage tightness and satisfaction with other subj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willingness of ginseng industry integration to participate in agricultur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with Logi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67.6% of the farmers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the overall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s high.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re resource endowment differences,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close interest linkages and satisfaction with other subjects. Among them, price risk, participation in enterprise work, sharing of tourism revenue and demand for cooperatives, enterprise satisfaction, cooperative satisfaction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Keywords: rural industrial integration; peasant househol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ginseng industry

一、问题的提出

农村产业融合识别要素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以农业即第一产业为基础,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延伸,形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第二,融合过程

限于“农村地区”;第三,生产要素跨界流动,包括技术、资本及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1,2]。农户的参与行为主要包括订单农业、企业务工、土地入股、土地流转、返租倒包、农业经商等方式^[3]。自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以来,产业融合视角下的现代农业发展问题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有利于我国多功能农业的发展^[4,5],有利于优化农业资源配置^[6],有利于推动

收稿日期:2018-09-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GL129)

作者简介:姜卓简(1993—),男,吉林长春人,硕士研究生。

农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是应对农业经济新常态的现实选择^[7]。从农民增收的角度来看,发展农村产业融合有利于农民收入稳定增长,有利于农民获取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生产服务,有助于农民规避市场风险^[8]。总的来看,农村产业融合可以通过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技术的扩散、改善农村环境、增加农民收益^[9]。

已有研究对于认识和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仅仅从技术层面、作用意义和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忽视了农户经济行为与农村产业融合的内在联系。第二,多基于企业、合作社的视角进行研究,缺少对农户主观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探讨。当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程度较低,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参与意愿不强^[10,11]。那么农户参与产业融合行为的影响因素究竟有哪些?这是当前加快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所必须解答的现实问题。第三,现有研究多是在参考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探索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规律,少有学者以实证的方式研究国内农村产业融合问题。

集安市位于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南麓,是世界最优质人参产区、全国边条参唯一产区、最大的林下参基地,是全国人参种植基地最大、全国人参精深加工能力最强、精深加工程度最高、林下山参交易规模最大、人参创新成果最丰富的产区。集安市人参产业融合发展主要采取以龙头企业为依托的纵向产业融合模式,即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以传统的人参种植业作为产业融合的基础,以先进的种植技术为第一推动力,以人参产品深加工为支撑,以观光农业为增长点,以生态农业为发展导向的一种“接二连三”的融合发展模式。2017年集安市人参产业产值达到80亿元人民币,人参产业总收入占集安市农民收入80%左右。集安市人参产业融合发展成效突出,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基于此,笔者拟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方法,以集安市人参产业融合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农户参与产业融合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二、变量选取与计量模型

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其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意愿是一种理性支配下的经济行为,以利润最大化

为目标^[12]。作为追求利润的理性经济人,能否实现收益最大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参与意愿。闫林楠等提出只有进一步完善农村产业融合利益联结机制才能有效地保障农民的利益,从而增强其参与意愿^[9]。农户的参与意愿受到自身情况和外部条件的影响^[13,14],农户会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差异作出判断^[15],家庭禀赋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农户参与意愿的常规变量。同时,农户是“有限理性经济人”,其行为选择受其意图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根据感知的可能风险及可能收入,判断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收益^[16],进而形成是否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初步态度。侯晶等研究也证明感知行为控制是农户参与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17]。和影响普通商品或服务消费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作为农村产业融合重要主体,农户的决策行为是使自己满意而不是最优^[18]。国内学者在研究农业产业化农户参与意愿时,都提到了农户对其他主体的满意度与其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11,19,20]。集安市参农参与农村产业融合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订单农业。由参农和企业协商,通过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产销合同,明确双方的责、权、利,以契约关系为纽带,建立相对稳定的契约关系。第二,返租倒包。企业根据生产规模进行土地流转,完成土地流转后,企业将租赁的土地再倒包给参农按照其要求进行生产,企业定期为农户提供生产技术服务,并统一销售。双方在合同中标定保底收购价,若市场高于收购价,则企业按照市场价收购人参。第三,伴随着集安市人参深加工业、人参批发市场和人参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参农通过参与人参文化旅游劳务和人参批发交易市场劳务等形式的第三产业融合获得非农收益。本研究在结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量化分析的需要,从参农的资源禀赋差异、感知行为控制、利益联结紧密度和对其他利益主体满意度四个维度选取影响因素变量。

(1) 资源禀赋差异。资源禀赋涉及参农自身的条件和拥有资源状况。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拥有生产资料的情况都有可能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影响^[21]。年龄越小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越可能接受新的生产经营方式^[22]。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可能更加依赖传统的生产经营

方式和过往的经验,故年龄对其参与意愿最终会产生负向影响。文化程度影响农民认知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理解参与产业融合转变生产经营方式的重要性,其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学习能力也会更强,因此预期受教育程度对参农参与意愿会产生正向影响。除此之外,拥有更多土地资源的参农相比于土地资源少的参农对突破技术瓶颈和规模经营的需求会有所降低,据此,预期家庭种植面积与参与意愿呈负向影响。基于此本研究选择受访参农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种植面积作为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因素变量。

(2) 感知行为控制。感知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所掌握的与所处环境相关的信息,并且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决定的能力。农户都是风险的规避者和利润的追求者,其决策行为会受个人对外界环境感知的影响^[23]。参农对人参产业可能存在风险的认知和对该产业未来收入的预期都可能会影响其决定。参农认为人参产业的价格风险越高,其参与人参产业融合、规避风险的愿望可能会越强。参农对现有经营模式下收入的预期较高,如果参与产业融合后的收入预期不会明显增加,会使参农参与产业融合的意愿降低。据此本研究选择价格风险认知、收入预期作为感知行为控制的二级变量。

(3) 利益联结紧密度。参农都是追求利润的理性经济人,能否实现增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参与意愿。而参农能否实现增收要通过与其他相关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来实现。姜长云认为,农村产业融合利益联结尚不完善,对农户带动不足,影响农户通过产业融合获得实惠^[24]。任志江的研究表明,稳定紧密的利益联结更有可能让农户学习生产技术、分享更多收益^[25]。同理,参农是否参与过龙头企业务工和分享到人参产业融合带来的非农收益也可以如实反映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利益联结的紧密程度。基于此本研究选择产业参与方式、参与企业务工、分享旅游收益、对合作社需求程度作为利益联结紧密度的影响因素变量。

(4) 对其他利益主体满意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多主体之间的融合,而农户作为农村产业融合中的重要参与主体^[26],若其在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合作中,经常处于弱势,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会造成其满意度低,那么自然会影响农户参与农村产业融

合的意愿。反之,若农户在合作中对其他利益主体满意程度较高,其参与意愿可能较强。杨凌的研究发现,满意度是反映农户参与意愿影响最大的指标^[27],据此本研究选择对企业满意度、对合作社满意度、对政府政策满意度作为参农对其他主体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变量。

由于参农参与产业融合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的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故使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来分析:

$$\log \frac{p_i}{1-p_i} = b_0 + b_1 x_{1i} + b_2 x_{2i} + \dots + b_k x_{ki} + \varepsilon_i$$

其中, p_i 代表第 i 个个案的发生概率; x_i 为第 i 个自变量, b_i 为第 i 个参数, k 为自变量的个数。

参农参与产业融合的意愿为被解释变量 Y , Y 是离散二值变量,设定愿意参加取值为 1,不愿意参加取值为 0。对于二元 Logit 回归函数,因变量 Y_i 的概率函数可以表示为: $P(Y_i) = p_i^{y_i} (1-p)^{1-y_i}$, 其中, $Y_i = 0, 1$; ($i=1, 2, 3, \dots, n$), 那么, Y_1, Y_2, \dots, Y_n 的似然函数为 $L = \prod_{i=1}^n p_i^{y_i} (1-p)^{1-y_i}$, 将似然函数两端取对数, 有:

$$\begin{aligned} \ln L &= \sum_{i=1}^n [Y_i \ln p_i + (1-Y_i) \ln(1-p)] \\ &= \sum_{i=1}^n [Y_i \ln \frac{e^{z_i}}{1+e^{z_i}} + (1-Y_i) \ln(1-\frac{e^{z_i}}{1+e^{z_i}})] \\ &= \sum_{i=1}^n [Y_i Z_i - \ln(1+e^{z_i})] \\ &= \sum_{i=1}^n [Y_i (b_0 + b_1 x_1 + b_2 x_2 + \dots + b_k x_k) - \ln(1+e^{b_0 + b_1 x_1 + \dots + b_k x_k})] \end{aligned}$$

使用极大似然估计迭代法,可以得到 Logit 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值。

三、数据来源及其计量结果分析

1.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8 年 7 月在集安市的实地问卷调查。调查区域为集安市人参产业相对集中的凉水镇、榆林镇、大路镇、麻线乡、太王镇、清河镇共 6 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抽取 4 个自然村,然后在每个抽到的自然村中随机抽取 10 个参农进行访谈和调查,调查的对象一般是户主或家庭主要决策者。调研采取多阶段随机走访的方式进行。此次调研共发放 240 份问卷,收回 240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225 份,有效率达到 94%。变量的赋

值及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 1。

在受访的 225 位参农中, 67.6% 的参农愿意参与产业融合, 整体参与意愿较高; 年龄区间在 41~50 岁和 31~40 岁的分别占 44% 和 26%, 说明受访者主要为有一定种植经验的中年参农; 59% 的受访参农为初中学历。价格风险认知方面, 38% 的参农认为有一定的风险, 62% 的参农认为从事人参种植存在很高的价格风险。受访参农对于自己的收入预期并不乐观, 53% 的参农认为未来几年的收入未必会有所提高。其原因是近几年集安市人参产业面临着一定的市场波动, 而参农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并不乐观。在产业参与方式方面, 26% 的参农仍然选择自由买卖这种传统的经营模式, 47% 的参农选择订单

农业, 而 27% 的参农选择返租倒包, 说明集安市人参产业融合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参农参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联结分配方式还较为单一。样本参农中有 167 名参农参与过龙头企业务工, 占总样本的 74%; 有 119 名参农分享过人参文化旅游收益, 占总样本的 53%。受访的 225 名参农中, 41% 的参农因正在参与企业合作或合作社合作而表示愿意继续参与合作, 43% 的参农对未来是否参与或继续参与合作表示仍在考虑, 16% 的参农不愿意继续参与合作。从参农对企业的利益分配机制的满意度来看, 8% 的参农选择了很不满意, 23% 的参农选择了不满意, 36% 的参农选择了一般满意, 18% 的参农选择了满意, 15% 的参农选择了很满意。

表 1 变量说明

变量名称	赋值	预期方向	均值	标准差
参与意愿	是=1; 否=0		0.676	0.469
资源禀赋差异				
年龄/岁	20~30=1; 31~40=2; 41~50=3; 51~60=4	-	2.884	0.832
文化程度	小学=1; 初中=2; 高中=3; 高中级以上=4	+	2.244	0.761
种植面积	0~3 亩=1; 4~7 亩=2; 8~10 亩=3; 10 亩以上=4	+/-	3.378	0.942
感知行为控制				
人参价格风险认知	基本无风险=1; 有一定风险=2; 风险很大=3	+	2.613	0.497
收入预期	不变甚至更少=1; 会有所增加=2; 将明显增加=3	+/-	1.604	0.713
利益联结紧密度				
产业参与方式	自由买卖=1; 订单农业=2; 返租倒包=3;	+/-	2.013	0.729
参与企业务工	是=1; 否=0	+	1.258	0.438
分享旅游收益	是=1; 否=0	+	1.471	0.500
对合作社需求程度	不想加入=1; 还在考虑=2; 已加入且会继续加入=3	+	2.244	0.718
对其他利益主体				
对企业满意度	很不满意=1; 不满意=2; 一般=3, 满意=4; 很满意=5	+	2.480	1.536
对合作社满意度	很不满意=1; 不满意=2; 一般=3, 满意=4; 很满意=5	+	1.644	1.827
对政府政策满意度	很不满意=1; 不满意=2; 一般=3, 满意=4; 很满意=5	+	2.733	0.891

2. 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1) 资源禀赋差异。年龄变量的关联系数为 -1.76215, 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说明年龄越小的参农越有可能接受新型的经营模式, 与预期相符。文化程度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原因可能在于集安市参农学历普遍不高, 大多只有初中学历, 样本差异性不大。种植面积对参与意愿产生负向影响, 但该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可能是因为集安市参农的种植面积差异不大故该变量并不显著。

(2) 感知行为控制。价格风险的认知情况与参与意愿呈正相关, 且在 1% 的水平下显著, 说明参农认识到了参与产业融合可以帮助其规避一定的风险, 这与预期方向相符。最近几年人参的价格并不稳定, 时有波动, 跌价的情况多于涨价, 为防止市场价格风险, 更多参农选择参与产业融合并

龙头企业或合作社签订订单合同, 确定人参的保底收购价和销路稳定, 这使他们的收益得到直接的保障。收入预期变量 P 值等于 0.776, 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当前人参产品价格处于波动下行时期, 参农对收入的预期普遍较低; 另一方面, 集安市人参产业融合尚处于起步阶段, 参农们对产业融合的增收效应尚不明确。因此, 收入预期变量对参农参与产业融合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3) 利益联结紧密度。从分析结果来看, 产业参与方式对参农参与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原因可能在于目前参农们参与利益分配的模式还比较单一, 集安市人参产业融合度不高, 接近一半的受访者选择了订单农业, 利益联结的紧密程度不高。参与企业务工和分享旅游收益两个变量都正向影响着参农参与人参产业融合的意愿, 且全部显

著。其中,参与企业务工变量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且系数为正,与预期相符。74%的受访参农参与过企业务工,近些年,随着集安市人参产业的快速发展,人参产品深加工及物流行业随即出现了较大的劳动力缺口,也让参农有机会分享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收益。除此之外,大地参业等大型人参企业通过返租倒包的方式,让参农直接成为企业的员工,这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保障了参农的收益。分享旅游收益对参农参与人参产业融合的意愿呈显著正向影响。清河人参交易市场 and 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兴起,为参农提供了除人参种植以外的市场空间,越来越多的参农通过农家乐的形式接待游客,以这种更直接的方式获得旅游收益。这说明参农通过人参产业融合可以将过去外部化的收益内部化,切实增加收入。参农与合作社合作的形式多数是股份合作制,大户牵头,按股分红,最终将产品统一出售,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参农

的销路提供了保障。作为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中的新型经营主体,集安市人参种植合作社、产销合作社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参农对合作社的需求程度越高,对新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带来的保障和收益越有信心,参与意愿也就越高,这与预期结果是相符的。

(4) 对其他利益主体满意度。参农对龙头合作企业的满意度、对合作社的满意度与其产业融合参与意愿呈正向相关,对企业满意度和对合作社满意度都在 1%水平下显著,与预期相符。这说明参农对于企业和合作社的满意度与其参与人参产业融合的意愿高度相关。参农对政府政策的满意度与参与意愿呈负相关, P 值等于 0.759,与预期不符。其原因可能是政府产业融合优惠政策的扶持对象主要是人参企业和农民合作社,且目前政府对参农违约情况的监管并不到位,这也直接影响参农对政府政策的满意度。

表 2 参农参与人参产业融合意愿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Z 值	P 值	回归系数	95%的置信区间
年龄	-1.762***	0.481	-3.67	0.000	-2.704	-0.820
文化程度	0.548	0.532	1.03	0.303	-0.494	1.589
种植面积	-0.397	0.345	-1.15	0.249	-1.073	0.278
价格风险认知	2.518***	0.768	3.28	0.001	1.013	4.023
收入预期	0.194	0.682	0.28	0.776	-1.142	1.530
利益分配方式	1.363	0.962	1.42	0.156	-0.522	3.247
参与企业务工	9.518***	2.499	3.81	0.000	4.619	14.417
分享旅游收益	6.562***	2.061	3.18	0.001	2.522	10.603
对合作社需求程度	2.817***	0.938	3.00	0.003	0.979	4.655
对企业满意度	4.289***	0.862	4.98	0.000	2.600	5.978
对合作社满意度	1.421***	0.444	3.20	0.001	0.550	2.292
对政府满意度	-0.192	0.625	-0.31	0.759	-1.416	1.032
_cons	-41.09***	9.581	-4.29	0.000	-59.866	-22.309
LR chi2(12)	209.59					
Prob > chi2	0.0000					
Pseudo R ²	0.7391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水平下显著。

四、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上述研究以集安市 6 个乡镇、24 个村的 225 户人参种植户为调查样本,基于拓展的农户经济行为理论,运用 Logit 回归模型分析参农参与产业融合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67.6%的参农愿意参与人参产业融合,整体参与意愿较高;资源禀赋差异、感知行为控制、利益联结紧密度和满意度

对参农参与人参产业融合意愿都有影响,其中文化程度、种植面积、收入预期、利益分配方式、对政府满意度对参农参与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参农的年龄、对风险的认知、利益分配机制、参与企业务工、分享旅游收益和对其他利益主体的满意度对参农的参与意愿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利益联结紧密度作为与参农收益关联程度最高的变量,对其参与意愿影响更大。

以上结论对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具有以下启示：第一，政府应继续大力推进产业融合进一步发展，促进产业技术融合，加强品牌建设，增强区域特色产业在市场上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农户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感知和了解，为当地产业融合发展打好基础。第二，坚持尊重农民意愿，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民获得合理的产业链增值收益，从根本上提升农户的参与意愿。第三，在农村产业融合初期，产业参与方式较为单一，主要是订单为主，致使农民产业融合的积极性、满意度不高，只有不断丰富产业融合的参与形式、提高农民满意度，建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利益协调机制，保障农民和经营组织能够公平分享一二三产业融合中的“红利”，真正实现农民增收，农村产业融合才能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郑媛榕.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认识问题及政策应用研究[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7(9): 101-105.
- [2] 冯伟, 石汝娟, 夏虹, 等.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湖北农业科学, 2016, 55(21): 5697-5701.
- [3] 李云新, 戴紫芸, 丁士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基于对345个农户调查的PSM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4): 37-44, 146-147.
- [4] 李俊岭. 我国多功能农业发展研究——基于产业融合的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09(3): 4-7.
- [5] 厉无畏. 中国产业发展前沿问题[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6] 段海波. 刍议农业产业融合机制和农业产业化[J]. 改革与战略, 2014(5): 75-78.
- [7] 姜长云.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新题应有新解法[J]. 中国发展观察, 2015(2): 18-22.
- [8] 岳田, 张建平. 关于推进十堰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思考[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8(19): 208-209.
- [9] 闫林楠, 雷显凯, 范旭丽, 等. 农村产业融合利益联结机制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7, 28(13): 9-12.
- [10] 贾璟琪, 王鑫, 魏旺拴. 健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研究——以山西省为例[J]. 经贸实践, 2018(21): 180.
- [11] 赵凯, 魏珊, 毕影. 农户加入不同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 53-58.
- [12] 颜华, 冯婷. 农民专业合作社普通成员的利益实现及其保障机制研究——基于黑龙江省25家种植业合作社的调查[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36(2): 34-40, 110-111.
- [13]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14] 恰亚诺夫. 农民经济组织[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 [15] 于艳丽, 李桦, 姚顺波, 等. 村域环境、家庭禀赋与农户林业再投入意愿——以全国集体林权改革试点福建省为例[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8(4): 119-126.
- [16] 周利平, 苏红, 邓群钊, 等.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农户参与用水协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J]. 广东农业科学, 2014, 41(6): 231-236.
- [17] 侯晶, 侯博. 农户订单农业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1): 17-24.
- [18] 贺东亮. 基于群决策的农地集体流转农户行为研究[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4.
- [19] 郭红东. 我国农户参与订单农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5(3): 24-32.
- [20] 祝宏辉, 王秀清. 新疆番茄产业中农户参与订单农业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7): 67-75.
- [21] 姚文. 家庭资源禀赋、创业能力与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用意愿——基于家庭农场视角[J]. 经济经纬, 2016, 33(1): 36-41.
- [22] 杨婷, 靳小怡. 资源禀赋、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土地处置意愿的影响——基于理性选择视角的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5(4): 16-25+95.
- [23] 吴江. 感知控制及其对消费者行为影响研究综述[J]. 消费导刊, 2010(3): 14-15.
- [24] 姜长云. 完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要拓宽视野[J]. 中国发展观察, 2016(2): 42.
- [25] 任志江, 任乐, 杨茹洁, 等. 浅谈临河区龙头企业与农民利益联结机制[J]. 现代农业, 2017(3): 63-65.
- [26] 芦千文.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述评[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6(4): 27-34.
- [27] 杨凌, 冯迪, 朱安琪.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安市的实证调查[J]. 农村经济, 2017(11): 103-107.

责任编辑: 李东辉